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心理學報，2020，52 卷，1 期，51–79 頁
http://doi.org/10.6251/BEP.202009_52(1).0003

父母與其五歲子女談論過去情緒經驗用語的差異*

王珮玲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父母與其子女的談話是幼兒早期情緒社會化重要途徑。談話中，父母分別扮演不同的情緒角色，讓子女重新建構對於情緒的意義，並學習文化脈絡下所重視的情緒價值，互動中，幼兒性別似乎也影響著父母情緒經驗的用語，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究父母與其子女談論過去情緒經驗用語的差異，關注的面向是詞彙量/情緒詞彙量、敘說方式和敘說內容。本研究對象分別各為 30 位 5 歲男孩和女孩與其父母，幼兒的語文能力中上。在家長同意下，至家中蒐集親子在快樂、難過、生氣和害怕情緒的談話及幼兒的語言能力。並參考 Wang 與 Fivush 等人（2005）的研究進行語料的編碼，以 *t* 考驗、卡方及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資料。結果發現，在詞彙和情緒詞彙上，父母之間無差異；但是父親對於男孩的情緒詞彙總量是高於女孩，母親則在男孩害怕的情緒詞彙量高於女孩。在敘說方式上，母親比父親較常出現重述方式，父親則比母親更常出現延展方式。與其子女談話中，母親比較會延展男孩的難過情緒，父親則是延展男孩的害怕情緒。在敘說內容上，當情緒事件以快樂和害怕為主題時，幼兒多描述情緒的引起是個人的感受，當情緒事件以難過和生氣為主題時，幼兒則多表示情緒是因人際互動而衍生的。至於情緒問題解決方法上，父母比較重視幼兒的生氣情緒，提供較多的解決方法，但多數父母都未能提供情緒的處理方法。依研究結果，建議父母、親職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應重視父親對於男孩情緒發展的獨特性、深入分析父母詞彙和情緒詞彙內涵的差異、探究父母與其子女延展方式的差異，以及提供幼兒情緒調節的方法。

關鍵詞：性別差異、敘說方式、敘說內容、親子談話

*本文通訊作者：王珮玲，通訊方式：peilinwang2016@gmail.com。

幼兒情緒的健全發展會影響其認知、社會和健康等各方面的發展（Kensinger & Schacter, 2016; Kubzansky & Winning, 2016），父母與其子女情緒談話是幼兒情緒社會化的重要情境，不僅能提供幼兒理解、調節和表達情緒的基本技能（Eisenberg et al., 1998），也影響其未來情緒的發展（Fivush & Wang, 2005）。對於正處於發展適切詞彙以表達內心情緒的幼兒，父母能藉由情緒的談話，協助他們理解抽象的情緒經驗、學習使用適切的詞彙表達情緒，以及提供解決負向情緒問題的方法。

不過，對於幼兒情緒的發展，我們相信父母在幼兒情感社會化的過程中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若依角色理論，男性仍被視為家庭經濟的主要提供者，女性視為幼兒的主要照顧者（Lamb & Lewis, 2010）。近年來，父親參與撫養子女的機會增多，但不可諱言的是，母親仍是大多數家庭的主要照顧者。這種角色劃分可能減少父親與子女互動的機會，也使得父親與子女討論情感的機會更少。更何況 Hoffmann 等人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以人際關係為導向，比較能解讀微妙的情感表達（Hoffmann et al., 2010）。因此，在與幼兒進行情感的交流上，母親可能比父親具有優勢。的確，美國有些研究發現，在親子情緒交流中，母親不僅比父親更常與幼兒進行情感交流，並使用較多和多變化的詞彙（例如，Fivush & Buckner, 2000），較能延展幼兒的情緒談話（例如，van der Pol et al., 2015），談論主題聚焦在人際關係（例如，Fivush & Buckner, 2003）。雖是如此，仍有少數研究發現父親在情緒詞彙（Adams et al., 1995; Reese et al., 1993; Reese et al, 1996），或是延展幼兒話語的能力（Zaman & Fivush, 2013）與母親是一致的。究竟父母之間的用語差異為何，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除了父母性別之外，幼兒的性別似乎也在父母情感社會化發生作用。許多文化中的性別角色觀念仍傳達著性別情緒的表達規則，因此父母對男孩和女孩的情緒社會化可能會受其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例如，我們期望女孩表現順從的情感，以維持社會互動的關係，期望男孩表現出不和諧情感以保護自己，如生氣情緒（Brody, 2000）。從研究中，也發現父母特別重視女孩的情緒經驗，常和他們談論情緒，使用較多和比較有變化的情緒詞彙，以及延展在難過和害怕情緒的談話（例如，Adams et al., 1995; Fivush & Buckner, 2000; Kuebli & Fivush, 1992; Reese et al., 1996）。雖是如此，Cassano 等人卻認為父母分別扮演不同的情緒角色，如母親容易察覺女孩的難過情緒，父親則是男孩的難過情緒（Cassano et al., 2007），Gottman 等人也提到，父親較能察覺男孩的生氣情緒（Gottman et al., 1997）。從父母較能察覺同性別幼兒的情緒，或許受性別認同的影響。

然而，親子情緒談話深受文化脈絡影響，在歐美文化中，認為情緒是建構孩子自我的重要面向，需要對幼兒充分的解釋和闡述，因此父母在幼兒早期常與他們談論情緒，關注其情緒感受，並鼓勵他們說出內在的情緒（Fivush & Wang, 2005; Wang & Fivush, 2005）；相對地，在華人文化中，認為情緒是幼兒與重要他人社會互動的結果，父母在談話過程擔任指導的角色，教導幼兒要表現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Wang, 2001），並常談論生氣情緒，希望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Fivush & Wang, 2005）。

由此可知，東西文化對於親子情緒談話有著不同的思維，但研究結果也不一致，尚無定論，因此對於深受東方文化影響的國人，父母與其子女談論過去情緒經驗用語的內涵為何，是為本研究主要探究的目的。

一、親子談論過去情緒經驗的重要性

親子談論過去的情緒經驗時，通常會包含與人、事、時、地、物有關的訊息，以及個人的想法和感受。Fivush（1993）認為回溯和談論過去情緒經驗時，對個人有情緒上的意義，因為過去經驗的情緒意義經常在回溯時才會展現。父母引導幼兒談論過去情緒經驗時，不僅會討論、敘說和協商自我及他人內在狀態，幼兒也能建構「過去」和「現在」，以及「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徵（Fivush & Nelson, 2006）。因此，回憶過去情緒的談話對於幼兒自我概念的發展特別重要，因為這些事件會成為自傳知識的基本核心，影響親子對於自我、他人和外在世界的覺察和觀點（Fivush & Wang, 2005）。

Lagattuta 與 Wellman（2002）提及，談論過去情緒經驗在於建構對於負向情緒的理解，以及過去和現在行為的關聯。而且，在回溯過去情緒經驗時，父母和幼兒才能思考事件發生時的當下情緒。因此，在談話過程中，父母不僅會引導子女將討論聚焦在重要的情緒經驗，淡化不重要的情緒，幼兒更可以專注在特殊情緒狀態的討論，並學習適切的情緒表達。主要原因在於，在事件發生的當下討論情緒，親子雙方可能處於高度焦慮的狀態下，思考和判斷會受到激烈的情緒狀態所箝制，彼此之間的談話可能會失焦，會以不適當、非理性的反應回應他人，或是處理自我的情緒（Fivush & Buckner, 2000; Fivush & Wang, 2005）。

Tomasello（1999）曾提出，對於幼兒而言，談論過去經驗主要的挑戰在於談話的主題並非當下的現實，幼兒必須有能力與成人互為主體，同時將注意力聚焦於相同的對象。Fivush 與 Nelson（2006）更提出，親子雖經歷類似的情緒事件，但是彼此間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回憶，藉由談話過程中，幼兒才會逐漸瞭解和學習他人可能無法以相同方式回憶同樣的經驗，必須經由語言的討論與協商獲得相互的理解，幼兒也會逐漸內化，以「人、事、時、地、物」的敘說方式，能夠更有組織的方式來儲存自己的情緒記憶，敘說自己的情緒經驗（Fivush, 1993）。因此幼兒的語言能力發展是一個基本必要門檻之外，對於幼兒來說，協商與獲得理解的過程是另一個挑戰。

綜上所述，談論過去情緒經驗有下列特殊的重要性：一是對於幼兒瞭解自我、他人和心智能力的發展影響頗鉅；二是讓幼兒有機會反省過去的行動，特別是與過去行動有關的感受、情緒；三是能避免親子在情緒當下處理問題的可能衝突；四是親子雙方能回溯過去完整的情緒經驗。家庭，是提供幼兒與人互動機會最多的環境，父母更是幼兒最常溝通的對象，因此深入瞭解親子過去情緒對話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價值。

二、父親和母親談論情緒經驗用語的差異

在美國和其他個人主義的文化中，透過自我陳述報告、書寫文本、口語表現內容、社會互動的觀察與臉部的表情都指出，女人在性別刻板模式的印象中，都比男人較強烈地表達情緒，而且女人辨識和瞭解他人口語及非口語的感受線索也優於男人；情緒表達的差異可能是為適應不同文化情境中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Schmitt, 2015）。Fischer 與 Manstead（2000）曾提及西方文化普遍的性別刻板印象是「情緒的女人」和「理性的男人」，認為女性較男性情緒化，是比較不理智的。至於女性與男性情緒經驗用語的研究中，女性比男性的情緒醒覺性高、情緒詞彙多、表達能力強，以及語句較為精緻活潑（Bajgar et al., 2005; Bauer et al., 2003; Fivush & Buckner, 2003; Niedzwienska, 2003; Thorne & McLean, 2002; Zaman & Fivush, 2011）。

上述研究指出兩性情緒經驗用語的差異，然而，Hyde（2005）曾以後設分析處理 46 篇性別差異的文章，證實男性和女性的高度相似，Zell 等人（2015）重新再評估性別相似性假設，收集 106 篇後設分析和 386 篇個別後設分析效量，並以後設綜合法估計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差異，結果發現不同領域兩性的平均絕對差異小，而且大部分的效果量也很小（Zell et al., 2015）。綜上所述，有關性別差異的研究發現仍不一致，有待更多研究深入探究。

在親子情緒談話中，身為男性的父親和身為女性的母親，其情緒經驗用語是否有差異? 依研究指出，與父親相比，母親常與幼兒討論情緒，有比較多和具變化的情緒詞彙，能延展幼兒話語，聚焦在人際關係的主題。如 Fivush 與 Buckner（2000）發現，母親情緒詞彙比父親多，在敘說方式上，母親想了解幼兒情緒發生原因，談論主題以人際關係為主。2009 年，Fivush 等人也發現母親比父親更能延展子女的話語，讓幼兒能充分表達內在的情緒（Fivush et al., 2009）。2013 年，Zaman 與 Fivush 再度研究父母延展幼兒談話的能力，但這次的對象是高社經白人父母，結果仍是發現，母親還是比父親較能延展幼兒的談話，並參與幼兒的談話。van der Pol 等人也認為母親比父親在闡述情感上更細膩，並延展幼兒情緒談話，讓他們能盡情地說出內在的感受（van der Pol et al., 2015）。至於 Aznar 與 Tenenbaum（2015）探究父母與其幼兒在說故事和情境圖卡的談話，結果也回應上述的研究，母親情緒詞彙比父親多。

雖是如此，仍有研究指出，父親和母親情緒經驗的用語是無差異。如在情緒詞彙上，Kuebli 與 Fivush（1992）、Adams 等人（1995）發現，父母的情緒詞彙無差異，意謂父親的情緒詞彙不少於母親。至於延展幼兒話語上，Reese 與 Fivush（1993）、Reese 等人（1996）指出父母之間無差異，但父親比較會出現重述幼兒的話語。Reese 等人（1996）更指出，與子女的談話的敘說方式，如延展、重述、評價和離題，父母是無差異的。Zaman 與 Fivush（2013）也指出，在六種回憶事件中，父母雖有不同的回憶經驗，但在延展幼兒的談話，是不受子女性別的影響。

綜上所述，有些研究指出，母親比父親的情緒詞彙量多，且較具延展力，比較會詢問幼兒情緒的原因，並關注其人際關係；但尚有研究提出，父親和母親在情緒詞彙和延展能力是無差異。國內無直接或間接的研究探究父母情緒用語的差異，Hyde（2005）指出性別的差異很小，可能有高度的相似。在這樣的信念下，父母在面對年紀尚小的幼兒，雖然他們能回應親子的情緒回憶（Reese et al., 1993），但可能受限於幼兒的語言理解能力，因此父母與其進行談話中，能使用的詞彙和情緒詞彙會有限。至於敘說方式，王珮玲等人曾提及，雖然父母在詞彙和情緒詞彙無差異，但深入了解其敘說方式時，發現母親是會受子女性別影響（王珮玲等人，2015），但目前現有的研究結果不一，有待進一步的論證。

三、父母與其子女談論情緒經驗用語差異的研究

（一）母親與其子女談論情緒經驗用語差異的研究

早在 1987 年，Dunn 等人（1987）曾進行小型追蹤研究，他們至家中蒐集母親與其子女、手足在自然情境的談話，結果獲知母子談話的主題很廣，包括睡覺、死亡、快樂、生氣、害怕等 19 項，此外，與男孩相比，母親比較常與女孩討論內在的情緒（Dunn et al., 1987）。1989 年，Fivush 認為唯有針對過去進行談話，才能讓雙方有完整的情緒經驗，因此她讓母親自由選擇情緒經驗，結果發現，雖然母親的情緒詞彙不受子女性別影響，但與女孩談話中，負向詞彙比正向的詞彙多，較常與幼兒討論負向情緒；在情緒陳述上，母親比較會延展女孩的情緒，但是解釋和協商則很少出現。2003 年，Fivush 與 Buckner 特別針對害怕、生氣、難過等情緒探究父母情緒經驗用語，也發現母親對女孩比男孩較常使用延展和評價的敘說方式，尤其是害怕情緒，情緒主題都以人際關係為主，尤其是生氣情緒，其次是難過和害怕情緒；至於在幼兒感到害怕和難過時，母親會提供解決方法，會想了解其生氣的原因。

Martin 與 Green（2005）也探究母親與其幼兒的談話：（1）父母離開孩子至外旅行過夜；（2）孩子在後院玩跌倒受傷；（3）家裏的狗跑掉了；（4）父母與孩子重逢。結果發現母親與其子女在情緒詞彙、獨特的詞彙，以及標示、解釋、澄清、結果、介入和誘發等敘說方式無性別差異，可能原因是受限於具體的故事情節，並非是母親與其子女共有的經驗。Kennedy Root 與 Rubin（2010）曾以問卷探究 125 位父母與其幼兒的情緒反應，發現母親比較會回應女孩的快樂情緒，詢問較多焦慮情緒的訊息。國內方面，王珮玲等人探究獨生子女與其母親的談話，發現母親與其子女的情緒詞彙量都無差異。但對於女孩，母親會指導其如何處理難過情緒；至於男孩，母親會想澄清其害怕的原因，也會提供解決方法（王珮玲等人，2015）。

至於跨文化研究上，Wang（2001）關注華人與美國母子情緒談話，並發現，與美國母親相比，華人母親選擇情緒事件是以人際主題為主，對於負向情緒，會以教導正確行為或是與他人重新建立關係，尤其對於生氣事件，似乎與華人「以和為貴」的觀念有關。2005 年，Fiuvsh 與 Wang 在華人和歐裔美人的研究中，獲知東西文化的相異和共同性，相異之處是，華人比歐裔美人使用較多的負向情緒詞彙，常討論生氣情緒，較少難過情緒；相同之處是，母親的情緒詞彙不因子女的性別有異，不會澄清子女的正向情緒，但在討論負向情緒時，不僅詞彙多，較有變化，雙方需要較多時間協商情緒，母親較常與女孩談論情緒及解釋情緒的原因。

綜上可知，在母親與其子女的談話中，大多數研究指出，母親的情緒詞彙不受子女性別的影響。或與可能幼兒年紀尚小，對於情緒語言的理解有限，因此影響母親與其子女在情緒詞彙的使用，因此本研究假設母親對其子女情緒詞彙的使用是一致的，不因子女性別產生差異。至於敘說

方式，研究結果不一，有的研究指出母親比較會延展女孩的情緒，有研究指出，無論男孩和女孩，母親都會延展其情緒，只是情緒類別不一，至於在東方文化重視的以和為貴，強調生氣情緒的談話，是否會出現在國人親子的情緒談話，則有待進一步的論證。

（二）父母與其子女談論情緒經驗用語差異的研究

1992 年，Kuebli 與 Fivush 讓父母與其子女回憶三個情緒事件，結果發現父母都對女孩比男孩使用較多和具變化的情緒詞彙，並常與女孩討論難過情緒。Adams 等人（1995）的研究中，父母分別在幼兒 40 個月和 70 個月時，與其回溯過去的情緒經驗，如參加親友的婚禮、參觀海洋世界等，發現父母對女孩比男孩使用較多和有變化的情緒詞彙，也常與女孩談論難過，以及不喜歡的情緒事件（Adams et al., 1995）。Reese 等人發現，與男孩相比，父母對女孩較常使用延展和評價的方式（Reese et al., 1996）。2000 年，Fivush 與 Buckner 也回應上述的研究，其研究認為，父母常會與女孩談論難過情緒及其起因，較少關注男孩的難過心情，並認為女孩在未來情緒發展上，比較會敘說難過情緒。由此可知，與男孩相比，似乎父母對於女孩會表現出較多和有變化的情緒詞彙，較常出現延展和評價的敘說方式，比較在意她的難過情緒。

但仍有研究認為，父母在子女的情緒發展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如 Gottman 等人指出，父親比較能敏銳察覺男孩的生氣情緒，並協助其調節其情緒，母親常與女孩談論難過情緒（Gottman et al., 1997）；Cassano 等人在探究父母性別對於幼兒調解悲傷情緒中，發現父親比母親更能覺知男孩的難過情緒，母親則是女孩的難過情緒，似乎父母比較能敏銳感受同性別子女的情緒（Cassano et al., 2007）；此外，Manczak 等人探究性別和父母人格對於家庭情緒談話的影響，從 74 對家中有 5 歲幼兒的家庭談話中，父親雖常與男孩討論他們的情緒，但還是少於母親與男女孩的情感交流（Manczak et al., 2016）。van der Pol 等人更提到，無論父親或母親，提到生氣情緒，就會聯想至男孩，快樂和難過情緒則是女孩（van der Pol et al., 2015）。由這些研究，似乎可歸納出，無論父親或母親都比較能察覺同性別幼兒的情緒。

綜上所述，雖然研究發現父母比較重視女孩情緒，但也發現父母較能感受同性別幼兒的情緒，尤其是父親對於男孩情緒發展，似乎扮演著一重要的角色。Maccoby（1998）也提出，在男孩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父親的態度比母親積極，Huston（1983）也指出父親常與男孩互動，是孩子的性別楷模，較能詮釋同性別幼兒的情緒。因此，與子女談論過去情緒經驗時，父母用語是否受子女性別影響，有待深入探究。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透過大台北各公立幼兒園的協助，共獲得 30 位男孩與其父母，以及 30 位女孩與其父母的同意參與研究。幼兒平均年齡為 63 個月（年齡範圍在 52 個月~64 個月）。選擇大約五歲幼兒的主要原因是，Fivush（1989）曾認為 30-35 個月的幼兒和母親談論過去事件時，很少使用情緒語言，而 Saarni（1999）提出 5 歲時的幼兒大多能區分各種情緒，Reese 等人的長期研究也發現，5 歲幼兒比較能回應親子的情緒回憶，於是本研究選擇 5 歲幼兒做為與父母進行情緒談話的對象（Reese et al., 1993）。

本研究對象父母的社經地位，依黃毅志（2003）所修訂之「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父母教育程度乘以 4，職業分數乘以 7，兩者相加為家庭社經地位指數，依其指數分類，高社經 44 位（73.33%），中社經 16 位（26.67%），但無低社經地位者。另外，因考量幼兒的語言能力可能會影響親子情緒談話內容，以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評估幼兒的語文能力作為參考，結果顯示參與者於本測驗之分數皆位於 PR50 以上（R = 65-96, M = 81.85, SD = 8.93）。

二、研究工具

由於親子的談話可能會受到幼兒語文能力影響，因此本研究使用「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甲式」以做為受試幼兒語文能力的指標。此測驗是陸莉與劉鴻香（1998）修訂自 Lloyd M. Dunn 與 Leota M. Dunn 於 1981 年編製的。此工具是評估 3-12 歲幼兒對聽覺接收與理解詞彙能力，每題以四幅圖畫呈現在一頁上，幼兒聽讀詞彙後，指出其中一幅圖為答案。題本分甲、乙兩個複本，各有試題 125 題，測驗的折半信度係數介在 .90 到 .97 之間，重測信度是 .90。本研究以此測驗的得分高低，包括原始分數和百分等級，作為受試幼兒語文能力的指標。

三、實施歷程

資料蒐集過程中，曾詢問臺北市幼兒園家長，以及過去曾連續 3 年參加氣質長期追蹤家長的意願。在家長同意後，至家中，先向父母說明實施流程。過程是先評估幼兒語文能力，之後，再請父母分別與其男孩/女孩談論過去曾經共有的快樂、難過、生氣和害怕等情緒事件。選擇這四種情緒的原因是：這些情緒是從出生至一歲之間即能發展出的基本情緒，是不同文化下成人最能回憶的早年童年經驗（Wang, 2001），對幼兒而言，是共通且熟悉的，也是家人對話中最常談論的情緒（Dunn et al., 1987; Fivush, 1993）。

父母與其孩子談話前，研究者提醒家長與其子女以下三件事：（1）四種情緒經驗是必須是倆人曾經共同參與的；（2）不要選擇有故事情節，因為可能會讓親子間的談話陷入故事的討論；（3）事件必須是兩個月內發生的事，目的是保有親子間的鮮明記憶，以避免親子討論的情緒經驗偏離主題（Wang, 2001; Fivush & Wang, 2005; Wang & Fivush, 2005）。在確認父母了解提醒的事項後，給予錄音筆，再請他們選擇家中一安靜的空間，讓他們分別錄下與孩子四種情緒的談話內容。過程中，可能先由父親與孩子兩人獨處先進行談話，也可能先由母親與孩子談話，誰先誰後未有限制。至於四種情緒事件的順序，由父母隨機變化，以對抗平衡方式處理之。對話的開始與結束都由父母自行決定，對話長度沒有特別限制，每種情緒經驗討論也無時間限制。在父母分別與孩子進行談話時，助理則在外面等候，確認是否需要協助。直至父母雙方分別與孩子錄完情緒談話後，助理會再進一步確認資料是否有問題，例如親子談話忘記錄下某種情緒經驗，助理會請父母再補錄談話內容。確認一切都沒問題後，我們會送給父母一本幼教雜誌、圖畫書和 300 元禮券一張，以表達感謝之意。

四、資料處理

（一）對話語料的編碼

1. 正式編碼前。在資料編碼前，先標示出情緒敘說的開頭與結尾。當對話者開　啟情緒的談話即為敘說的開始，結束則是對話者停止討論此情緒，或是變換主題、開始談論另一個經驗即是視為某一情緒經驗談話的結尾，並計算談話時間。在對每一敘說設立明確的界線後，將敘說編碼至四種情緒事件，並計算父子、父女、母子和母女在四種情緒平均談話時間，如表 1 所示。整體而言，若從父母與幼兒進行情緒談話的平均時間而言，母親高於父親的，其中秒數最長的是母女在難過情緒的時間（M = 68.31 秒），其次是母子在害怕情緒的時間（M = 64.79 秒）；其中父親與男孩在害怕情緒時間最長（M = 60.40 秒），對女孩的談話比較短（M = 38.54 秒）。但進一步進行父母與子女性別為獨變項的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害怕情緒經驗談話交互作用效果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 F (1, 42) = 4.98，p = .03，但後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顯示，當對話內容是有關害怕情緒時，母親情緒經驗談話的秒數顯著高於父親 F (1, 42) =7.38，p = .009，其他的檢定都無顯著差異。

表 1　父母與其子女在四種情緒經驗談話的秒數平均值和標準差

	快樂		難過		生氣		害怕	
	M	*SD*	*M*	*SD*	*M*	*SD*	*M*	*SD*
父子	49.33	38.22	56.37	31.04	56.05	37.34	60.4	44.92
父女	41.30	32.49	48.96	44.75	45.43	35.41	38.54	33.54
母子	54.84	42.14	64	46.87	60.33	38.52	64.79	33.78
母女	61.97	67.29	68.31	57.64	61.21	37.8	64.04	44.99

2. 正式編碼。親子對話語料進行處理後即開始正式編碼，編碼係參考國外相關研究，以及研究關注的面向，分為下列三個項目：

（1）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幼兒談論過去情緒經驗時，父母情緒詞彙量使用的多寡是一重要指標（例如，Fivush et al., 2000; Reese et al., 1996）。不過，親子談話過程中，時間愈長，詞彙量可能比較多，但不表示情緒詞彙量也比較多，例如「我們昨天去動物園，看到好多動物喔」，這整句話都是事件陳述，未出現情緒詞彙。

本研究在詞彙量的計算，僅處理親子談話中，父親和母親的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詞彙的計算，先確認四種情緒，然後使用「中研院斷詞系統」的線上系統計算詞彙。至於情緒詞彙則參考 Fivush 與 Wang（2005）研究進行語料編碼，其定義是：a. 明白指涉情緒狀態的形容詞用語，如快樂、生氣、難過等；b. 對事物有情緒相關的評價，如好好玩的溜滑梯；c. 表達情緒的嘆詞，依對話脈絡以判斷感嘆詞是否為情緒表現，如孩子到收到喜歡的玩具時，他會以「哇~~」來代替情緒語詞的回應。

（2）敘說方式。Wang 與 Fivush（2005）界定敘說方式（narrative style）是指在回憶過去的談話中，互動雙方如何引發和提供訊息。敘說方式包括所建構的故事類型和親子口語互動的模式（p. 479）。他們分析資料時關注以下三個面向：一是談話長度、二是命題總數、三是命題的類型。從命題類型的定義和範例來看，這些類型也可以視為敘說方式的類型，因此本研究採用重述、延展和澄清等方式，其意義和實例如下所述。

a. 重述。父母重述幼兒的話語，沒有包含任何新的訊息，但蘊含同理幼兒的情緒。見 16 號的母子談話。

媽媽：你最生氣什麼？
男孩：人家不跟我玩，我生完氣就直接自己去玩。
媽媽：喔，你生完氣你就直接去玩喔。
男孩：嗯。

b. 延展。Fivush 與 Wang 及 Wang 與 Fivush 提出延展是父母開啟一主題，將對話引導至事件的另一層面或是依據一特定的事情提供新的訊息，但延展話語是與情緒議題有關，並非是只有事件的談話，而且親子間的對話至少要有連續 3 次以上的輪次（Fivush & Wang, 2005; Wang & Fivush, 2005）。

例如 14 號母子的對話有 4 次輪替：

媽媽：你現在很難過嗎？男孩：是啊！
媽媽：是呀，但我沒看過你如此難過，你難過甚麼？
男孩：我難過媽媽不見了。

c. 澄清。父母和幼兒對於情緒事件的認知不一致時的延展談話，至少需有 3 個輪替以上的對話（Fiuvsh & Wang, 2005）。

媽媽：弟弟，你很害怕？
男孩：我沒有害怕呀！
媽媽：但是你看起來很害怕，所以才跑來找媽媽的。
男孩：我是很難過才來找媽媽的。

（3）敘說內容。Wang 與 Fivush（2005）界定敘說內容（narrative content）是由母親和孩子提供特定的訊息內容，其研究中，分自我和人際關係、情緒調節（包括歸因、解釋、說教、情緒問題解決）；（Fivush 等人）則是分為事實、情緒、歸因、原因和問題解決。參考上述兩篇研究，其

中事實、原因並非個人關注的，至於情緒和歸因，本研究認為可以由情緒詞彙了解 （Fivush et al., 2000; Sales et al., 2003）。因此在敘說內容上，本研究關注情緒主題和負向情緒解決方法。

a. 情緒主題。親子情緒談話中所討論的主題，大多數都是父母選擇的情緒經驗，因此本研究想探究父母比較關注的是幼兒個人所產生的情緒經驗，或幼兒在參與社會互動中所引發的情緒主題。因此參考 Fivush 等人（2003）的編碼。他們將情緒事件分為個人主題（personal theme）和人際主題（social theme）。個人主題係指情緒的起源與幼兒自身經驗有關，如，「我害怕黑黑的」。人際主題，係指情緒的起源與幼兒參與社會互動時所引的，如，「哥哥搶我玩具，我很生氣」。一個情緒經驗只有一個主題，計算單位以「次」為主，如下例所示，56 號母女在害怕情緒的談話，主題是怕狗，屬於個人主題，計算一次。

媽媽：那‧‧最近‧‧最近‧‧‧姨丈把歐克利帥帥帶到家裡來你覺得怎麼樣？
女孩：很可怕。
媽媽：很可怕喔那他們為什麼你覺得很可怕？
女孩：因為狗狗會咬人。
媽媽：狗狗會咬人還有呢？
女孩：因為奶奶家的狗狗也會咬。
媽媽：奶奶家的狗狗也會咬所以你喜歡狗嗎？
（女孩搖頭）
媽媽：你不喜歡狗對不對？
女孩：把他們帶到奶奶家去。
媽媽：他帶到奶奶家去不要在我們家是嗎？
女孩：我想要去奶奶房間可是有狗狗在我就不想要去。
媽媽：有狗狗在你就不想要去是不是？
女孩：是。

b. 負向情緒解決方法。幼兒從父母處學習如何處理或是調節負向情緒的方法，是有助於其情緒的發展。本研究特別關注對於負向情緒，父母是否會提供幼兒處理負向情緒的方法。Wang（2001）的編碼分為重新確認、人際關係的重建、道德教導、無解決方法四項。王珮玲等人（2015）也提出安心、與他人重新建立關係、道德教導和未提供解決方法等。從語料中，未出現重新確認，反而安慰出現率較高，尤其是在難過情緒。因此在提供負向情緒方法上，分為三類，即安慰、人際關係的重建和教導，每一負向情緒以一次計算。

（a）安慰。父母以口語或肢體安慰幼兒，減緩情緒對他們造成的不安感受。如，「你怕黑黑的，不要怕，爸爸會陪你的」（10 號父親）、「妹妹，不要難過，讓媽媽抱一下，你應該就會比較好一些」（3 號母親）。

（b）人際關係的重建。教導幼兒與引起他們負向情緒的人重新建立和諧關係，如，「你不應該搶陳偉的玩具，他是你的好朋友，去跟他說對不起，說你們還是好朋友」（11 號媽媽）。

（c）教導。教導幼兒正確的情緒經驗和行為，如「你生氣的時候，不應該隨便打人，這是不好的，你應該好好地跟人家講，不要隨便動手」（23 號母親）。

（d）未提供解決方法。父母對於幼兒的負向情緒未提供任何的方法。

（二）資料的信度

本研究以評分者間一致性信度作為信度考驗的方法。處理方法為從 120 份語料中隨機選取 20% 做為信度檢定樣本。研究者與另一位曾受過幼兒教育研究所訓練之專業人員建立評分者間信度。研究者先向該員說明編碼原則、分類項目等內容，並舉例說明，待其充分了解編碼方法後，雙方分別針對研究者隨機抽取的樣本進行編碼，以斯皮爾曼積差相關計算評分者間一致性程度。其分析結果：情緒詞彙為 .90，情緒陳述方法中的重述為 .88，延展為 .80，澄清為 .88，情緒內容中的情緒主題和負向情緒解決方法各為 .89，評分者信度範圍為 .80~ .90。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19.0 版進行下列分析，並以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t* 考驗和卡方考驗等分析父母與其子女在詞彙量、情緒詞彙量、敘說方式和敘說方式的差異。

結果

依父母與其子女的情緒談話，結果分三部分呈現：一是父母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二是父母與其子女在敘說方式的差異，包括重述、延展和澄清，三是父母與其子女在敘說方式的差異，包括親子情緒談話主題和父母提供幼兒負向情緒的解決方式。

一、父母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一）父親與母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父母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如表 2。在統計考驗方面，變異數同質性假設的符合與否會影響到變異數分析中 *F* 檢定的適切性，本研究中的變異數分析皆已同過經過同質性檢定。本研究在四種情緒上，父母與子女在詞彙的交互效果未達顯著水準，至於父母、子女的主要效果亦未達顯著水準。至於父母與其子女在情緒詞彙的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3，四種情緒的父母與子女性別的交互效果未達顯著水準，至於父母、子女的主要效果亦未達顯著水準。

表 2　父母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情緒	子女	父詞彙量		母詞彙量		父情緒詞彙		母情緒詞彙	
	性別	*M*	*SD*	*M*	*SD*	*M*	*SD*	*M*	*SD*
快樂	男孩	72.86	57.55	75.57	68.73	7.95	7.86	6.67	6.84
	女孩	59.33	51.26	77.48	87.98	4.67	3.36	7.44	6.91
	合計	65.25	53.93	76.65	79.33	6.10	5.94	7.10	6.81
難過	男孩	87.74	56.02	81.00	50.10	6.89	4.23	7.42	3.95
	女孩	69.42	85.93	88.79	75.64	6.75	5.11	7.92	7.01
	合計	77.51	73.98	85.35	64.99	6.81	4.69	7.70	5.80
生氣	男孩	87.58	57.79	75.47	35.18	8.47	6.88	8.00	4.10
	女孩	65.15	66.02	85.30	42.24	5.89	4.01	7.78	4.70
	合計	74.41	63.08	81.24	39.37	6.96	5.47	7.87	4.42
割怕	男孩	96.85	75.65	100.10	55.91	11.85	12.01	8.85	5.36
	女孩	68.42	75.32	89.96	76.32	7.17	6.98	6.58	4.98
	合計	81.34	75.95	94.57	67.25	9.30	9.76	7.61	5.22
總計	男孩	348.79	219.53	326.16	163.33	36.00	23.06	30.11	12.65
	女孩	272.65	223.74	343.40	248.56	26.65	14.62	28.60	16.84
	合計	309.74	222.14	335.00	208.82	31.21	19.52	29.33	14.77

表 3　父母與其子女在情緒詞彙的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情緒	來源	型 III SS	*df*	平均平方和	*F* 值	顯著性	淨 η^2
快樂	父母（相依）	13.15	1	13.15	.54	.47	.01
	子女（獨立）	37.15	1	37.15	.66	.42	.01
	父母*子女	97.52	1	97.52	4.01	.05	.08
	組內	3706.29	92				
	受試者間	2586.81	46	56.23			
	誤差	1119.48	46	24.34			
	總數	3854.11	95				
難過	父母（相依）	15.20	1	15.2	.83	.37	.02
	子女（獨立）	0.65	1	0.65	.02	.9	.00
	父母*子女	2.17	1	2.17	.12	.73	.00
	組內	2334.76	82				
	受試者間	1583.72	41	38.63			
	誤差	751.04	41	18.32			
	總數	2352.78	85				
生氣	父母（相依）	11.17	1	11.17	.54	.47	.01
	子女（獨立）	43.94	1	43.94	1.56	.22	.03
	父母*子女	31.12	1	31.12	1.51	.23	.03
	組內	2148.07	88				
	受試者間	1240.37	44	28.19			
	誤差	907.70	44	20.63			
	總數	2234.30	91				
害怕	父母（相依）	70.04	1	70.04	1.55	.22	.04
	子女（獨立）	263.47	1	263.47	3.59	.06	.08
	父母*子女	31.86	1	31.86	.71	.41	.02
	組內	4974.27	84				
	受試者間	3078.35	42	73.29	3078.35		
	誤差	1895.92	42	45.14	1895.92		
	總數	5339.64	87				
總計	父母（相依）	75.81	1	75.81	.57	.46	.02
	子女（獨立）	574.08	1	574.08	1.25	.27	.03
	父母*子女	299.81	1	299.81	2.24	.14	.06
	組內	21905.14	74				
	受試者間	16954.77	37	458.24			
	誤差	4950.37	37	133.79			
	總數	22854.84	77				

（二）父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表 4 顯示父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狀況。由 *t* 考驗得知，父親與其子女的詞彙量未達顯著差異水準。在情緒詞彙上，總計四種情緒詞彙量，父親對於男孩高於女孩 $t(41) = 2.13$，$p < .05$，但在四種具體情緒，無論在快樂、難過、生氣和害怕情緒，父親與其子女的對話狀況，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

表 4　父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情緒詞彙量的 *M*、*SD*、比例與 *t* 值

		父親詞彙量			父親情緒詞彙量			父親情緒詞彙／全部詞彙量比例		
		M	*SD*	*t*	*M*	*SD*	*t*	*M*	*SD*	*t*
快樂	父子	72.86	57.55	.86	7.95	7.86	1.96	.16	.17	1.28
	父女	59.33	51.26		4.67	3.36		.11	.08	
難過	父子	87.74	56.02	.77	6.89	4.23	.38	.1	.08	-1.05
	父女	70.81	83.52		6.35	5.12		.13	.08	
生氣	父子	90.29	59.06	1.48	8.43	6.54	1.67	.12	.08	-.66
	父女	63.79	64.6		5.93	4.05		.13	.07	
害怕	父子	96.85	75.65	1.41	11.85	.04	1.82	.12	.04	-0.73
	父女	66.71	71.34		6.46	.08		.13	.08	
合計	父子	87.2	54.88	1.55	9	5.76	2.13*	.13	.11	-.05
	父女	61.43	53.37		5.91	3.75		.13	.07	

（三）母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表 5 可知母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情緒詞彙量之狀況。透過 *t* 考驗得知，在詞彙量上，母親與其子女在快樂情緒、難過情緒、生氣情緒、害怕情緒，皆未有顯著差異；至於情緒詞彙量上，除了害怕，母親對於男孩高於女孩外，快樂情緒、難過情緒、生氣情緒母親與其子女亦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至於母親情緒詞彙占全部詞彙量比例，母親與其子女也未有顯著差異。

表 5　母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情緒詞彙量的 *M*、*SD*、比例與 *t* 值

		母親詞彙量			母親情緒詞彙量			母親情緒詞彙／全部詞彙量比例		
		M	*SD*	*t*	*M*	*SD*	*t*	*M*	*SD*	*t*
快樂	母子	86.12	70.09	.28	7.92	7.34	.19	.1	.06	-1.06
	母女	80.13	84.87		7.57	6.61		.12	.09	
難過	母子	116.56	95.02	.69	.32	7.49	.70	.11	.05	.15
	母女	99.59	86.03		8.9	7.35		.10	.07	
生氣	母子	98	58	.18	13.55	5.21	.31	.10	.04	.64
	母女	95.03	59.52		15.39	6.99		.10	.05	
害怕	母子	119	67.92	.91	10.29	6.12	2.07*	.09	.04	.22
	母女	100.07	78.86		7.07	4.99		.09	.06	
合計	母子	104.92	81	.72	10.52	6.46	.88	.10	.13	.47
	母女	94.92	85.31		9.73	76.46		.10	.08	

*$p < .05$.

二、親子於情緒對話中敘說方式之分析結果

（一）父母與其子女在各類敘說方式的差異

父母與其子女在「重述」、「延展」，以及「澄清」等敘說方式之次數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如表 6。首先，在「重述」的次數，以父母與其子女為獨變項的二因子變異數，在快樂與難過情緒中，父母的主要效果皆達統計顯著水準，二者事後比較顯示母親的「重述」的敘說方式亦顯著皆高於父親（快樂 $F(1, 46) = 7.71$，$p = .008$；難過 $F(1, 42) = 0.10$，$p = .002$），交互作用效果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其他情緒類別之交互作用效果或主要效果則均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

其次，就「延展」的次數，以父母與其子女為獨變項分別針對在不同情緒類別所進行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7。其中，在生氣情緒中，僅獨變項子女的主要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 F (1, 46) = .74，p = .047，且父母對男孩的「重述」次數顯著高於對女孩的「重述」次數。其次，在害怕情緒中，父母與子女性別二獨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 F (1, 43) = 3.47，p = .005（圖 1），後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顯示當對話內容是有關害怕情緒時，父親僅對男孩的「延展」顯著高於母親 F (1, 43) = 7.77，p = .008，且父親的「延展」敘說方式以男孩高於女孩 F (1, 86) = 8.89，p = .004。至於其他情緒類別，父母與子女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與主要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

此外，在「澄清」的次數，各種情緒類別的父母與子女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與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6　父母與其子女在敘說方式次數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情緒	子女性別	父重述		母重述		父延展		母延展		父澄清		母澄清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快樂	男孩	0.19	0.51	0.43	0.60	0.43	0.75	0.14	0.48	0.00	0.00	0.00	0.00
	女孩	0.11	0.42	0.48	0.75	0.19	0.49	0.23	0.43	0.00	0.00	0.00	0.00
	合計	0.15	0.46	0.46	0.68	0.30	0.62	0.19	0.45	0.00	0.00	0.00	0.00
難過	男孩	0.26	0.56	0.21	0.54	0.32	0.48	0.26	0.45	0.05	0.23	0.05	0.23
	女孩	0.20	0.65	0.32	0.56	0.40	0.71	0.08	0.28	0.04	0.20	0.04	0.20
	合計	0.23	0.60	0.27	0.54	0.36	0.61	0.16	0.37	0.05	0.21	0.05	0.21
生氣	男孩	0.60	0.60	0.25	0.44	0.45	0.51	0.30	0.47	0.00	0.00	0.00	0.00
	女孩	0.32	0.72	0.32	0.72	0.21	0.42	0.18	0.39	0.04	0.19	0.04	0.19
	合計	0.44	0.68	0.29	0.62	0.31	0.47	0.23	0.42	0.02	0.14	0.02	0.14
害怕	男孩	0.60	0.75	0.50	0.76	0.80	1.06	0.25	0.44	0.05	0.22	0.15	0.37
	女孩	0.56	0.92	0.24	0.52	0.20	0.41	0.44	0.65	0.04	0.20	0.08	0.28
	合計	0.58	0.84	0.36	0.65	0.47	0.81	0.36	0.57	0.04	0.21	0.11	0.32

表 7　父母與其子女在「延展」敘說方式的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情緒	來源	型 III SS	*df*	平均平方和	*F* 值	顯著性	淨 η^2	主要效果
	父母（相依）	.36	1	.36	1.37	.25	.03	
	子女（獨立）	.13	1	.13	.39	.54	.01	
	父母*子女	.61	1	.61	2.36	.13	.05	
快樂	組內	26.36	90					
	受試者間	14.74	45	.33				
	誤差	11.62	45	.26				
	總數	27.46	93					
	父母（相依）	.75	1	.74	2.81	.10	.06	
	子女（獨立）	.05	1	.05	.21	.65	.00	
	父母*子女	.39	1	.39	1.45	.24	.03	
難過	組內	21.63	84					
	受試者間	10.44	42	.25				
	誤差	11.19	42	.27				
	總數	22.82	87					
	父母（相依）	.2	1	.20	.95	.34	.02	男 > 女
	子女（獨立）	.74	1	.74	4.17	.05*	.05	
	父母*子女	.08	1	.08	.36	.55	.01	
生氣	組內	17.97	92					
	受試者間	8.21	46	.18				
	誤差	9.76	46	.21				
	總數	18.99	95	.21				
	父母（相依）	.53	1	.53	1.37	.25	.03	
	子女（獨立）	.93	1	.93	1.8	.19	.04	
	父母*子女	3.47	1	3.47	8.9	.00**	.17	
害怕	組內	39.12	86	.52				
	受試者間	22.36	43	0.39				
	誤差	16.76	43					
	總數	44.05	89					

*p < .05. **p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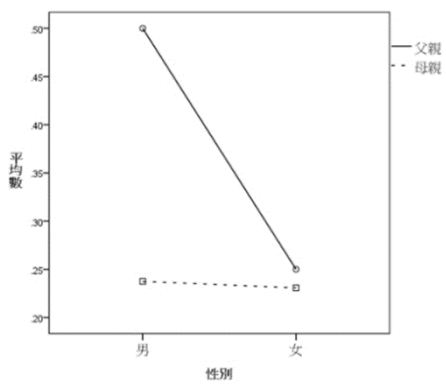


圖 1　父母與其子女在害怕情緒「延展」敘說方式之交互作用效果

（二）父親與其子女在敘說方式的差異

表 8 除顯示對於各類敘說方式次數的描述，其中僅在害怕情緒的「延展」方式中，父親對於男孩所展現的次數高於女孩外 t (23.28) = 2.35，p < .05，其他三種情緒的重述、延展和澄清都無性別差異。

表 8　父親與其子女在敘說方式的 M、SD 與 t 值

		重述			延展			澄清		
		M	*SD*	*t*	*M*	*SD*	*t*	*M*	*SD*	*t*
快樂	父子	.19	.51	.59	.43	.75	1.25	.00	.00	.00
	父女	.11	.42		.19	.49		.00	.00	
難過	父子	.26	.56	.39	.32	.48	-.37	.05	.23	.22
	父女	.19	.63		.38	.70		.04	.20	
生氣	父子	.57	.60	1.37	.43	.51	1.65	.00	.00	-.85
	父女	.31	.71		.21	.41		.03	.019	
害怕	父子	.60	.75	.41	.80	1.06	2.35*	.05	.22	.24
	父女	.50	.88		.21	.42		.04	.19	

*p < .05.

（三）母親與其子女在敘說方式的差異

表 9 除顯示各類敘說方式之次數狀況的描述，其中僅在難過情緒，母親對於男孩的「延展」高於女孩 t (33.36) = 2.10，p < .05，其他三種情緒的「重述」和「澄清」都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

表 9　母親與其子女在敘說方式的 M、SD 與 t 值

		重述			延展			澄清		
		M	*SD*	*t*	*M*	*SD*	*t*	*M*	*SD*	*t*
快樂	母子	.48	.59	.26	.20	.58	-.25	.00	.00	.00
	母女	.43	.73		.23	.43		.00	.00	
難過	母子	.36	.64	.09	.40	.65	2.10*	.04	.20	-.88
	母女	.34	.61		.10	.31		.10	.31	
生氣	母子	.25	.44	-.56	.33	.48	1.03	.04	.20	.13
	母女	.34	.72		.21	.41		.03	.19	
害怕	母子	.58	.72	1.85	.29	.46	-.98	.17	.38	.99
	母女	.26	.53		.44	.64		.07	.27	

*p < .05.

三、親子於情緒對話敘說內容之分析結果

敘說內容之分析包括情緒主題和父母提供幼兒負向情緒問題的解決方法，各項結果分析如下：

（一）父母與其子女在情緒主題次數之分析

表 10 顯示父母與其子女談論情緒事件時，對於快樂情緒大多以個人主題為主，其中父女的 21 次（77.78%）最高，但父母之間與其子女之間差異都未達顯著差異 （χ^2 = .31, p > .05; χ^2 = 1.24, p > .05）。於難過情緒內容中母女的 20 次（71.43%）最高，但父母與其子女之間差異都未達顯著差異（χ^2 = .022, p > .05; χ^2 = .09, p > .05）；至於生氣情緒，其中父女和母女的 25 次（89.29%） 最高，父母與其子女之間差異都未達顯著差異（χ^2 = 1.84, p > .05; χ^2 = .002, p > .05），最後是害怕情緒，其中父女 24 次（85.71%）最高，父母與其子女之間差異也都未達顯著差異（χ^2 = 1.48, p > .05; χ^2 = .83, p > .05）。由上述可知，除了母女談論快樂情緒，會略偏向人際主題外，親子談論快樂和害怕情緒時，主題主要以個人主題為主，例如「去公園溜滑梯很快樂」、「我怕蟑螂」，在難過和生氣情緒時，

主題主要以人際主題為主，例如「哥哥不理我的時候」、「弟弟搶我玩具」。但整體而言，父母對其子女選擇情緒主題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表 10　父母對其子女選擇情緒主題的次數和卡方檢定表

情緒	男孩／女孩	個人主題（%）	人際主題（%）	χ^2
快樂	父子	18（72.00）	7（28.00）	
	父女	21（77.78）	6（22.20）	.31
	母子	16（61.54）	10（38.46）	
	母女	14（46.67）	16（53.33）	1.24
難過	父子	7（29.17）	17（70.83）	
	父女	8（30.77）	18（69.23）	.022
	母子	6（24.00）	19（76.00）	
	母女	8（28.59）	21（72.41）	.09
生氣	父子	6（25.00）	18（75.00）	
	父女	3（10.71）	25（89.29）	1.84
	母子	3（11.54）	24（88.46）	
	母女	3（10.71）	25（89.29）	.002
害怕	父子	20（76.92）	6（23.08）	
	父女	24（85.71）	4（14.29）	1.48
	母子	17（68.00）	8（32.00）	
	母女	21（77.78）	6（22.22）	.83

（二）父母提供子女在負向情緒問題解決方法次數之分析

由表 11 可知，透過卡方檢定父母之間對其子女提供負向情緒問題解決方法次數進行分析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不過，從提供的次數可知，在難過情緒上，父親教導男孩，有 4 次（12%），至於女孩，父母安慰她的次數，分別有 3 次（11.54%）、4 次（13.33%）。至於重建人際關係未出現，未提供問題解決方法則占 80%以上。在生氣情緒，父母都偏向使用教導的方式，母女有 8 次（28.57%）、父子 7 次（29.17%）、母子有 6 次（20.69%），父女只有 3 次（10.71），至於安慰上，除了母子外，都各有 1 次，在重建人際關係的提供上，都針對男孩，如母子有 3 次（10.34%），父子 2 次（8.33%），女孩都未出現；未提供問題解決方法，父女最高，有 24 次（85.72%），最低是父子 14 次（58.33%）。在害怕情緒，父母對於男孩都是偏向教導，各占 4 次（15.39%）及 5 次（20%），在安慰上，父親會偏向女孩，2 次（7.14%），母親偏向男孩，有 4 次（16%），至於未提供問題解決方法，父女最高，有 25 次（89.29%），最低是母子 16 次（64%）

表 11　父母提供子女負向情緒問題解決方法的次數和卡方檢定表

情緒	父母／子女	教導（%）	安慰（%）	重建人際關係（%）	未提供解決辦法(%)	χ^2
難過	父子	4（12.00）	1（ 4.00）	0	20（80.00）	2.00
難過	父女	1（ 3.85）	3（11.54）	0	22（84.61）	2.00
難過	母子	2（ 8.00）	3（12.00）	0	20（80.00）	2.00
	母女	2（ 6.67）	4（13.33）	0	24（80.00）	
生氣	父子	7（29.17）	1（ 4.17）	2（ 8.33）	14（58.33）	2.00
	父女	3（10.71）	1（ 3.57）	0	24（85.72）	
	母子	6（20.69）	0	3（10.34）	20（68.97）	2.00
	母女	8（28.57）	1（ 3.57）	0	19（67.86）	
害怕	父子	4（15.39）	0	0	22（84.61）	2.00
	父女	1（ 3.57）	2（ 7.14）	0	25（89.29）	
	母子	5（20.00）	4（16.00）	0	16（64.00）	2.00
	母女	3（11.11）	1（ 3.70）	0	23（85.19）	

討論

一、父母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一）父親與母親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雖然過去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表達能力強、情緒詞彙多，語句較為精緻（Fivush & Buckner, 2003; Zaman & Fivush, 2011），或是母親比父親話多，使用多變化的詞彙（例如，Fivush et al., 2000）。然而，本研究卻發現，與幼兒的情緒談話中，無論在快樂、難過、生氣和害怕的情緒上，父親和母親的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是無差異的。此結果，可覺察父親在幼兒情緒發展過程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與幼兒的情緒談話中，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與母親是不分軒輊。父母在詞彙和情緒詞彙量無差異的現象支持原先的推論，因為父母沒有差異的可能原因是，受限於幼兒年紀尚小，對於語文理解及表達能力有限，因此在談話過程中，父母不會使用太複雜或較為艱澀的詞彙和情緒詞彙，而是使用在此年齡層幼兒能聽得懂的詞彙與他們談話；另一原因可能是，父親和母親分別能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中，與幼兒單獨地進行情緒交流，談話的氛圍和空間是輕鬆自在和安全的，所以，無論父親或母親都能很如地與幼兒談話。其中，尤其是父親，能暢所欲言地與孩子談話，或者是有意識地引導幼兒的對話，以致我們特別發現父親在詞彙和情緒詞彙與母親無差異。

由上述發現，我們似乎低估父親平日對於幼兒情緒發展的影響力。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母親是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當他們有生理或心理需求時，找尋對象大多是母親，而非父親，或是當孩子有需求想找父親談話時，他們可能因為工作之因未能在家或晚回家，以致形成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較少與父親談話，任何事大多向母親傾訴或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法。因此，我們經常看見母親與幼兒的談話，較少看見父親與子女對話的畫面。然而，在本研究中，卻看見更深層的內涵，當讓父親與幼兒有獨自的空間進行情緒談話時，父親情緒表達的角色顯得突顯，他們很能盡興地與孩子談論情緒，並非是表象上少於言詞的父親形象。由此發現，雖然在幼兒社會情緒發展上，母親的情緒角色雖然重要，但不能忽視父親在幼兒情緒發展上的重要的地位。此結果，也回應 Hyde（2005）的性別相似的假設。

她不認同過去多數研究提出男性和女性差異大的論點，在回顧 46 篇性別差異中，提出兩性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相似的論點；Zell 等人更在不同性別和文化下的情緒一文中，也分析後設分析文章，更發現男女之間的差異很微小（Zell et al., 2015）。

（二）父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若只探究父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從總量可知，父親與男孩是高於父親與女孩的，此發現不同於過去的研究:父親對女孩的詞彙和情緒詞彙是高於男孩（Adams et al.,1995;

Kuebli & Fivush,1992; Fivush et al., 2000; Zeman et al., 2010）。不過，若分別探究四種情緒，無論在快樂、難過、生氣和害怕情緒，父親不會因為子女性別有差異。不過，從此結果或許可以看見一現象是，父親除了重視與女孩的談話，也未忽略與男孩的談話。可能的原因是，如前所述，如果能夠提供父親與其子女談話的兩人獨處空間時，父親都能放鬆地、自在地與孩子談話，在此談話過程中，讓我們能深入的看到父親與其子女的情緒談話。因為身為家中經濟支持者的父親，在家的時間很少，或是較晚回家，以致孩子較少有機會與父親談話；或者是父母都同時在家時，父親可能較習慣和孩子玩大肢體或是操作性的遊戲，較少有情緒談話，更可能認為應由母親擔任此角色較為適切。在研究中，提供父親分別與其子女獨自說談話的時間與空間，他們或許比較珍惜，也比較能與孩子盡情的談話，無論男孩或女孩，都同樣重視。另一可能的原因是與研究對象有關，研究中的父親都是中上社經地位，其中部分的父親曾經連續長期參加研究者嬰兒至幼兒的三年追蹤研究，過程中，不受氣候或其他因素影響，父親都會帶嬰幼兒至實驗室進行研究，表示這群父親本身教育理念很好，也非常重視幼兒的發展，用心經營與幼兒間的關係，以致父親的詞彙和情緒詞彙不受子女性別的影響。

（三）母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

若只探究母親與其子女在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的差異，從結果可知，母親只有在害怕情緒的情緒詞彙對於男孩高於女孩，其他的情緒詞彙都沒有差異。

本研究的結果不同於王珮玲等人的發現，他們認為母親在四種情緒上的詞彙量和情緒詞彙量不因其子女性別有差異（王珮玲等人，2015；Fivush et al., 2000; Fiuvsh & Wang, 2005; Martin & Green, 2005）。本研究的發現，其可能的原因是，過去的刻板角色印象認為男人是勇者的象徵，要承擔重責大任的人，是不應該害怕任何事物，因為害怕可能表示膽怯，不應該出現在男孩身上的。但是本研究的母親觀念，不同於過去的思惟，她們認為男孩更應該要特別察覺害怕情緒，因此從男孩小時後的談話中，盡量讓男孩們能理解與學習害怕的情緒詞彙，讓他們能適時學會以適切的情緒詞彙表達內在害怕的感受，而非將之壓抑在心中不說出來或是不知如何以適切的語言表達，所以母親會使用較多的情緒詞彙與男孩談論害怕，讓他在未來的成長過程中，能以合宜的詞彙表示內在的害怕情緒感受。

不過，從整體詞彙量可知，母親對於子女在負向情緒談話是比正向情緒多，因為與子女談論負向情緒是需要特別花心力的，是需要母親和其子女雙方努力去共同解決的（Bird & Reese, 2006; Fivush & Sales, 2006; Fivush et al., 2008）。負向情緒需要親子雙方予以澄清，或者解釋，母親也會透過談話教導孩子如何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等，以致母親與其子女在負向情緒中的詞彙較多。其中尤以生氣情緒的詞彙是高於其他三種情緒，或許與華人文化特別重視和諧的人際關係，不要出現生氣情緒以破壞人際關係，因此特別重視生氣情緒問題的處理與解決（Wang, 2001）。

二、父母與其子女情緒敘說方式的差異

（一）父親與母親敘說方式的差異

由結果獲知，母親比父親較會重述幼兒的快樂情緒，換句話說，母親比較會同理幼兒的快樂情緒，也會讓幼兒放心，能知覺到母親有接收到他的話語，理解他話中的感受。例如 31 號母女的談話，幼兒：「我生日那天，媽媽買的草莓蛋糕好好吃喔，我很開心」媽媽：「你覺得覺得很開心，因為蛋糕好好吃…」。至於延展幼兒話語的敘說方式，竟然發現父親高於母親，結果不同過去美國研究的發現，認為母親比父親較能延展孩子的談話（Fivush et al., 2009; Fivush & Buckner, 2003; Zaman & Fivush, 2013），或是，Reese 等人所認為的父母在延展上是無差異（Reese & Fivush, 1993; Reese et al., 1996）。推論原因是，可能與本研究對象的特性有關，如前面所述，本研究的父親，除了都具中上社經地位之外，比較特別的是，有部分父親是從幼兒只有四個月大時，曾經連續三年不間斷地參加研究者的長期追蹤研究，可知這群父親從小就長期關注孩子各方面發展，全心全意協助孩子的成長，不同於一般父親的特質。另一原因可能是，若依社會角色理論的觀點，父親比母親更希望將子女形塑成傳統的性別角色，以維護男性在權力和社會地位上的優勢（Eagly et al.,

2000），因此藉由與子女獨自的談話空間中，特別延展與子女的談話。而且 Denham 等人指出，父親比母親更有可能以刻板的性別角色觀點回應男孩和女孩的情緒（Denham et al., 2010）。對於此發現，由於本研究人數有限，研究對象又是中上社經地位的父母，國內目前也無直接或間接的實證研究可以進行討論，未來有待更多的研究投入，才能釐清此現象。

（二）父親與其子女敘說方式的差異

若只看父親與其子女在四種情緒談話上，與女孩相比，父親比較會延展男孩在害怕情緒的談話。可能的原因是，在社會期望下，希望男孩要勇敢，不應該害怕任何事物，害怕對男孩是不適切的行為表現（Fischer & Manstead, 2000）。因此父親與男孩獨自談話下，他們知覺自己是男孩的性別楷模，認為男性應擔任保護他人的角色，是勇者的象徵，不應該害怕任何事情，因此從小就要教他，長大後才能承擔重大責任。例如 13 號父子間的談話。父：「那天沒有開燈，黑黑的，你也不，你也怕一個人在黑黑的地方，為什麼你這麼怕?…」子：「我怕暗暗的..我怕爸爸媽媽不見了」父：「為什麼你怕爸爸媽媽不見了?」子：「我怕爸爸媽媽不見了」父：「你是男生耶..你不要害怕呀…你要像爸爸呀…」。謝妮娜等人（2018）的研究也提出，害怕是幼兒產生焦慮及憂鬱可能的特質之一（謝妮娜等人，2018），Rapee 與 Coplan（2010）也提出害怕可能是導致心理症狀的危險因子。父親延展男孩的害怕情緒，是有助於其未來身心的發展，可以預防未來心理疾病發生的可能。

有別於過去只探究母親或是雙親的研究，因為多數的研究，多認為母親較會延展子女的情緒談話（Melzi et al., 2011; Zaman & Fivush, 2013）。換句話說，獨自探索父親與其子女情緒談話，卻有不一樣的看見，翻轉過去認為父親較少涉入子女情緒角色，以及對其子女情緒發展影響的觀點。形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是父親比較能同理同性別幼兒的情緒狀態，也如 Maccoby（1998）所說的，父親也比較能投入同性別的角色社會化中，其實父親的情緒雖少表達，但一經表露卻更顯得突出而重要（McDowell & Parke, 2005）。尤其在男孩成長過程中的情緒發展。但長期以來，我們只能看見父親與男孩打鬧遊戲的外在現象，但在本研究已看見，父親的角色不再僅是工具性功能，只負責家中經濟和保護的功能（Finley & Schwartz, 2006），他們也影響男孩的情緒發展。依此發現，未來我們應更重視及肯定父親在親職教育的情緒角色。

（三）母親與其子女敘說方式的差異

若只看母親與其子女在四種情緒談話上，與女孩相比，母親比較會延展男孩在難過情緒的談話，至於其他敘說方式，子女未有差異。此發現，讓我們有不一樣的看見，母親是非常重視男孩的難過情緒，因為母親會想辦法在談話中，引導孩子的談話至另一層面或是提供新的訊息，讓他們在母親的延展下，能多說說自己的難過情緒。可能的原因與母親教養信念有關，他們希望男孩不應如同過去扮演著「有淚不輕彈」的刻板角色，只要心中有任何委曲或是不舒服的事時，都要能說出來，以抒發心中的不愉快。更何況難過情緒可能與未來憂鬱發生的機率有關（Fivush & Buckner, 2000），因此母親希望在男孩幼年早期，讓他們多說說難過情緒。

不過，母親重視男孩的難過情緒是不同於過去研究所發現，認為母親比較會延展女孩難過情緒（王珮玲等人，2015；Fivush & Buckner, 2003; Fivush & Zaman, 2013; Reese et al., 1996），或是延展女孩害怕情緒（Fivush et al., 2003），以及延展男孩在快樂情緒的談話（Wang et al., 2000）等研究。也與研究中提出母親應會重視子女生氣情緒的觀點不同。其原因可能與現代社會文化脈絡有關，因為幼兒的心理健康會影響他在各方面的學習，因此母親會特別重視幼兒難過情緒的處理，尤其是男孩。因為男孩可能未來需要擔負更重的責任，壓力較大，因此，盡可能延展他在難過情緒的話語，說出心中的感受，從小學習察覺、理解和處理此情緒。總之，母親究竟比較會延展男孩或是女孩的難過情緒，或是生氣情緒?目前相關研究，尚無定論，有待未來更多研究投入探究。

三、父母與其子女敘說內容的差異

（一）父母與其子女在情緒主題的差異

親子談話過程中，通常是由父母主動引發情緒事件。從結果可知，除了母女的快樂情緒外，父母與其子女的談話，在快樂及害怕情緒中，主要聚焦在個人主題。在快樂情緒上，父親談論的主題有：「出去玩、運動、得到物品、吃東西…」，母親的主題是「運動、出去玩、彈鋼琴、玩電動、吃點心、收到生日禮物、看故事書…」，其中父母和幼兒談論「出去玩」的次數最高，母親談話的主題較父親多元。至於害怕情緒上，父親主題有：「怕走丟、怕黑、怕做惡夢、怕看醫生、怕一個人睡、怕動物、怕昆蟲、怕輸、怕颱風、怕警察、怕狗…」，母親是「怕黑、怕蟲、怕狗、怕拔牙、怕打雷、怕看牙醫、怕媽媽不在身邊、怕自己一個人被關在電梯..」，不過，對於害怕情緒，反而父親的主題較多、範圍較廣。本研究不同 Fivush 等人（2003）的發現，他發現母女的情緒主題只要聚焦在人與人的關係，母子則是個人主題，但本研究發現母子和母女都是以個人主題為主，究竟是個人或人際主題，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至於難過和生氣情緒，主要聚焦在人際主題。在難過情緒上，父親與其子女談論的主題有：「與親人分離、被大人懲罰、被別人欺負、手足搶玩具」，母親是「與同學相處不融洽、被媽媽打／罵、哥哥不理我、手足搶玩具、媽媽沒時間陪自己」，其中以「與家人分離或是被罵」出現的比例最高。此發現也回應 Fivush 等人（2000）的研究，當父母與其子女談論難過情緒時，主題是聚焦在人際主題上。於生氣情緒，父親的情緒主題是「手足的欺負、被家人限制不能出去玩、與他人玩遊戲輸了」，母親是「手足欺負、玩具被搶走、他人不借玩具、被同儕打或欺負」，由上可知，父母與孩子談論生氣的主題，常是因為手足而起，少數是被同儕欺侮。

（二）父母提供幼兒負向情緒問題的解決方式

對於幼兒負向情緒問題解決方法上，在難過情緒，對於男孩，父親偏向教導，母親偏向安慰，對於女孩，父母都採用安慰的方式，似乎因子女的性別的差異，採取不同的方法。但原則上，母親都會安慰，男女孩的情緒，或許認為孩子年紀小，在他們難過時，重要的是安慰他們以撫平其情緒。至於生氣情緒，無論父親或母親，出現教導的次數都比難過和害怕情緒高，在重建人際關係上，母親會特別告知男孩。有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在華人社會氛圍下，重視人際的和諧關係，認為生氣情緒的出現會破壞人際關係（Wang, 2001），而且華人比較在意幼兒對嫌惡情感的表達（Fivush & Wang, 2005），因此特別重視生氣情緒的處理。在害怕情緒上，父母對於男孩都是偏向教導，父親會偏向安慰女孩，母親偏向男孩。至於三種負向情緒，多數父母在談話中，不會特別提供其子女問題解決方法，尤其是在難過情緒，至於生氣情緒，似乎華人社會比較在意要教好下一代子女，以維繫和諧的關係，因而未提供方法的比例稍低。至於害怕情緒，母親會特別教導男孩問題的解決方法。

建議

基於上述的發現與討論，本研究對於父母、親職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建議如下：

一、應特別重視父親對於男孩情緒發展的獨特性

從過去多數的研究發現，父母常花比較多的時間與女孩談論情緒，情緒詞彙量較有變化，或是延展情緒談話（Adams et al., 1995; Fivush et al., 2000; Kuebli & Fivush, 1992; Reese et al., 1996），似乎較少關注男孩的情緒發展。不過，在本研究特別發現，與子女進行情緒談話，父親延展話語的能力高於母親，尤其是對於男孩的害怕情緒，至於生氣、難過情緒是沒有性別差異的。若獨自探究父親與子女的情緒談話時，也明顯看見父親對於男孩的總詞彙量和總情緒詞彙是高於女孩。

從上述看見，在父親與其子女獨處的空間中，特別看見父親心思細膩較為柔性的的一面，不僅對於男孩有較多的話語，更會延展男孩在害怕情緒談話。這或許是父親與男孩彼此間的悄悄話時間，能自在地道盡心中的話語，由上可知父親在男孩情緒發展上有其獨特的影響力。建議在親職教育上，不應只將父親的角色設定在經濟上的支柱，應該重視和肯定父親在幼兒情緒社會化中的獨特地位，並讓父親知覺自己在男孩的情緒社會化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或許在家中開闢出一父子悄悄話專屬時間，讓父親能盡情地與男孩說說情緒事件，男孩也能從與父親的互動中，學習適切的情緒表達方式。

二、深入分析父母詞彙和情緒詞彙內涵的差異

本研究雖發現母親的詞彙量高於父親，父母在情緒詞彙無差異。詞彙量的量化資料，雖能客觀探究父母使用詞彙的差異，但卻無法了解詞彙量背後的意涵。過去，Harrison 與 Magill-Evans（1996）的研究曾發現母親比父親使用較有變化的語言，Fivush 等人（2000）也認為母親比父親是用較多的特定情緒詞彙；Wang 與 Shelley（2007）在探究男女在情緒語言的差異時，曾發現女性傾向使用形容詞和動詞，男性是名詞，語形（morphological）是有性別差異的。或許在未來的研究，可再深入探究父親或母親分別可能會使用的特定詞彙、情緒詞彙，或是語言形式，以提供未來研究的參考。

三、探究父母與其子女延展方式的差異

從研究可知，父親的延展幼兒話語的能力高於母親，但只探究父親與其子女，父親比較能延展男孩在快樂、生氣和害怕情緒的談話，女孩則是難過情緒，至於探究母親與其子女，可知母親比較會延展男孩在難過和生氣情緒，女孩則是害怕情緒。雖從量上看見上述的現象，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父母的延展內涵是否有所差異？Zaman 與 Fivush（2013）曾提及美國、拉丁美洲、紐西蘭和中國的研究，發現母親延展方式是有差異的，例如延展可以分為低延展和高延展類型，此兩種對於幼兒敘說技巧、對過去經驗的回憶和幼兒安全依戀也有不同的影響。建議未來研究，或許可以深入探究延展內涵，以了解父親和母親分別在四種情緒高低延展類型的差異，並探究幼兒可能的回應。

四、父母應提供幼兒負向情緒的調節方法

從研究中可知，多數父母在親子情緒談話中，很少提供幼兒調節負向情緒的方法，尤其是難過和害怕情緒。至於生氣情緒，無論父親或母親都會特別教導子女解決方法，重新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似乎與華人以和為貴的觀念有關，希望維繫和諧氛圍，因此也會特別在意教導子女處理自己的生氣情緒，雖是如此，但是方法的提供仍有限。至於害怕情緒，母親會特別關注小男孩的情緒解決，但是提供問題解決方法仍偏低。為了讓幼兒學習以適切的方法處理負向情緒，增進其情緒健全發展，建議父母應要透過情緒談話，讓孩子察覺和理解情緒，並學會調節自己負向情緒的方法，以利情緒的發展。

本研究雖然初步發現，父親和母親在幼兒情緒發展的各自扮演的重要角色，不過，由於研究中的父母大多來自中上階層，且樣本人數有限，可能會影響進一步的推論。只冀望此篇研究的初步發現，能提供未來對於親子情緒談話有興趣的研究者做為進一步探索的依據，更期待接續的研究，能逐漸拼出國人親子情緒談話更完整、更周延的圖像。

參考文獻

王珮玲、邱貞瑜、胡中凡、黃于庭（2015）：母親與子女對過去情緒經驗談話的性別差異。**教育心理學報，46**（3），377–400。http://doi.org/10.6251/BEP.20140613[Wang, P.-L., Chiu, C.-Y., Hu, J.-F., & Huang, Y.-T.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past emotion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6*(3), 377–400. http://doi.org/10.6251/BEP.20140613]

陸莉、劉鴻香（1998）：**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指導手冊**。心理。[Lou, L., & Liu, H. (Revs.). (1998). *Revised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Mandarin Chinese version.* Psychological.]

黃毅志（2003）：「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教育研究集刊，49**（4），1–31。[Hwang, Y.-J. (2003). The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new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socioeconomic scores for Taiwa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esear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December, 49*(4), 1–31.]

謝妮娜、王珮玲、趙家琛（2018）：兒童氣質與焦慮及憂鬱傾向之關聯。**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1**（1），1–28。http://doi.org/10.30074/FJMH.201803_31(1).0001[Hsieh N.-N., Wang, P.-L., & Chao, C.-C. (2018). Temperament associated with childhoo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endency.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1*(1), 1–28. http://doi.org/10.30074/FJMH.201803_31(1).0001]

Adams, S., Kuebli, J., Boyle, P. A., & Fivush, R.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past emotion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Sex Roles, 33*(5/6), 309–323. http://doi.org/10.1007/BF01954572

Aznar, A., & Tenenbaum, H. R. (2015).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emotion talk.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 148–155. https://doi.org/10.1111/bjdp.12069

Bajgar, J., Ciarrochi, J., Lane, R., & Deane, F. (2005). Development of the 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scale for children (LEAS-C).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3*(4), 569–586. http://doi.org/10.1348/026151005X35417

Bauer, P., Stennes, L., & Haight, J. (2003).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ner self in autobiography: Women’s and men’s use of internal states language in personal narratives. *Memory, 11*(1), 27–42. http://doi.org/10.1080/741938176

Bird, A., & Reese, E. (2006). Emotional reminisc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tobiographical sel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4), 613–626.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42.4.613

Brody, L. R. (2000). The socializa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Display rules, infant tempera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In A. H. Fischer (Ed.), *Gender and emo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p. 24–47). Cambridge University.

Cassano, M., Perry-Parrish, C. & Zeman, J. (2007). Influence of gender on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s sadness 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6*, 210–231. http://doi.org/10.1111/j.1467-9507.2007.00381.x

Denham, S. A., Bassett, H. H., & Wyatt, T. M. (2010).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preschoolers' emotional competenc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8*, 29–49. https://doi.org/10.1002/cd.267

Dunn, J., Bretherton, I., & Munn, P. (1987). Conversations about feeling states between mothers and their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3*(1), 132–139. http://doi.org/10.1037/0012-1649.23.1.132

Eagly, A. H., Wood, W., & Diekman, A. B. (2000). Social role theory of sex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 current appraisal. In T. Eckes & H. M. Trautner (Eds.), *The develop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of gender* (pp. 123–174). Erlbaum.

Eisenberg, N., Cumberland, A., & Spinrad, T. L. (1998).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9*, 241–273. https://www.jstor.org/stable/1449728

Finley, G., & Schwartz, S. J. (2006). Parsons and Bales revisited: Young adult children'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athering role.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7*(1), 42–55. http://doi.org/10.1037/1524-9220.7.1.42

Fischer, A. H., & Manstead, A. S. R. (2000). The rel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emotion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 A. H. Fischer (Ed.), *Gender and emo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71–9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8191.005

Fivush, R. (1993). Emotional content of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In C. A. Nelson (Ed.), *The minnesota symposia on child psychology, Vol. 26. Memory and affect in development* (pp. 39–77).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Fivush, R. (1989). Exploring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motional content of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Sex Roles, 20* (11/12), 675–691.

Fivush, R., & Buckner, J. P. (2000). Gender, sadness, and depre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focus through gendered discourse. In A. H. Fischer (Ed.), *Gender and emotion: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pp. 232–253). Cambridge University.

Fivush, R., & Buckner, J. P. (2003). Creating gender and identity through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In R. Fivush & C. A. Haden (Ed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pp. 149–167). Lawrence Erlbaum.

Fivush, R., & Nelson, K. (2006). Parent-child reminiscing locates the self in the past.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 235–251. https://doi.org/10.1348/026151005X57747

Fivush, R., & Sales, J. M. (2006). Coping, attachment, and mother-child narratives of stressful event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2*, 125–150. https://doi.org/10.1353/mpq.2006.0003

Fivush, R., Sales, M., & Bohanek, J. G. (2008). Meaning making in mother's and children's narratives of emotional events. *Memory, 16*(6), 579–594.

Fivush, R., & Wang, Q. (2005). Emotion talk i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of the shared past: The effects of culture, gender, and event valence.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6*(4), 489–506. https://doi.org/10.1207/s15327647jcd0604_3

Fivush, R., & Zaman, W. (2014). Gender, subjective perspective, and autobiographical consciousness. In P. J. Bauer & R. Fivush (Eds.), *The Wiley handbook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emory* (pp. 586–604). Wiley Blackwell.

Fivush, R., Berlin, L. J., Sales, J. M., Menutti-Washburn, J., & Cassidy, J. (2003). Functions of parent-child reminiscing about emotionally negative events. *Memory, 11*(2), 179–192. http://doi.org/10.1080/741938209

Fivush, R., Brotman, M. A., Buckner, J. P., & Goodman, S. H.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emotion narratives. *Sex Roles, 42*(3/4), 233–253.

Fivush, R., Marin, K., McWilliams, K. & Bohanek, J. G. (2009). Family reminiscing style: Parent gender and emotional focus in relation to child well-being.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10*(3), 210–235. https://doi.org/10.1080/15248370903155866

Gottman, J., Fainsilber-Katz, L., & Hooven, C. (1997). *Meta-emotion: How families communicate emotionall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arrison, M. J., & Magill-Evans, J. (1996). Mother and father interactions over the first year with term and preterm infants.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19*, 451–459. https://doi.org/10.1002/(SICI)1098-240X(199612)19:6<451:AID-NUR1>3.0.CO;2-N

Hoffmann, H., Kessler, H., Eppel, T., Rukavina, S., & Traue, H. C. (2010). Expression intensity, gender and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Women recognize only subtle facial emotions better than men. *Acta Psychological, 135*, 278–283. http://doi.org/10.1016/j.actpsy.2010.07.012

Huston, A. C. (1983). Sex-typing. In E. M.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p. 387–467). Wiley.

Hyde, J. S. (2005). The 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6), 581–592.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60.6.581

Kennedy Root, A., & Rubin, K. H. (2010). Gender and parents' reactions to children's emotion during the preschool year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8*, 51–64. http://doi.org/10.1002/cd.268

Kensinger, E. A., & Schacter, D. L. (2016). Memory and emotion. In L. F. Barrett, M. Lewis, & J. M.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564–578). Guilford Press.

Kubzansky, L. D., &Winning, A., (2016). Emotions and health. In L. F. Barrett, M. Lewis, & J. M.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613–633). Guilford Press.

Kuebli, J., & Fivush, R. (1992).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past emotions. *Sex Roles, 27*(11/12), 683–698. http://doi.org/10.1007/BF02651097

Lagattuta, K. H., & Wellman, H. M. (2002). Differences in early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negative versus positive emo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8*(4), 564–580.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8.4.564

Lamb, M. E., & Lewis, C.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of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in two-parent families. In M. E. Lamb (Ed.),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pp. 94–153). Wiley.

Maccoby, E. E. (1998). *The two sexes: Growing up apart, coming together*.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nczak, E. M., Mangelsdorf, S. C., McAdams, D. P., Wong, M. S., Schoppe-Sullivan, S., & Brown, G. L. (2016). "How Did That Make You Feel?" Influences of gender and parental personality on family emotion talk. *Merrill-Palmer Quarteraly, 62*(4), 388–414. https://doi.org/10.13110/merrpalmquar1982.62.4.0388

Martin, R. M., & Green, J. A. (2005). The use of emotion explanations by mothers: Relation to preschoolers' gender and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14*(2), 229–249. http://doi.org/10.1111/j.1467-9507.2005.00300.x

McDowell, D. J., & Parke, R. D. (2005). Parental control and affect as predictors of children's display rule use and social competence with peers. *Social Development, 14*, 440–457. http://doi.org/10.1111/j.1467-9507.2005.00310.x

Melzi, G., Schick, A. R., & Kennedy, J. L. (2011). Narrative elabo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wo dimensions of maternal elicitation style. *Child Development, 82* (4), 1282–1296. http://doi.org/10.1111/j.1467-8624.2011.01600.x

Niedźwieńska, A. (2003). Gender differences in vivid memories. *Sex Role, 49*(7-8), 321-331. http://doi.org/10.1023/A:1025156019547

Rapee, R. M., & Coplan, R. J. (2010). Conceptual relations between anxiety disorder and fearful temperament.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7*, 17–31. http://doi.org/10.1002/cd.260

Reese, E., & Fivush, R. (1993). Parental styles of talking about the pas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596–606. http://doi.org/10.1037/0012-1649.29.3.596

Reese, E., Haden, C. A., & Fivush, R. (1993).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Relationships of style and memory over time. *Cognitive Development, 8*(4), 403–430. http://doi.org/10.1016/S0885-2014(05)80002-4

Reese, E., Haden, C. A., & Fivush, R. (1996). Mothers, fathers, daughters, sons: Gender differences in autobiographical reminiscing.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9*, 29–56. http://doi.org/10.1207/s15327973rlsi2901_3

Saarni, C.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Guilford.

Sales, J. M., Fivush, R., & Peterson, C. (2003). Parental reminiscing about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Journal of Cognition, 4*(2), 185–209. http://doi.org/10.1207/S15327647JCD0402_03

Schmitt D. P. (2015).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ly-variable sex differences: Men and women are not always different, but when they are…it appears not to result from patriarchy or sex role socialization. In T. K. Shackelford, & R. D. Hansen (Eds.), *The evolution of sexuality* (pp. 221–256). Springer.

Thorne, A., & McLean, K. C. (2002). Gendered reminiscence practices and self-definition in late adolescence. *Sex Roles, 46*(9/10), 267–277.

Tomasello M. (1999).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er Pol, L. D., Groeneveld, M. G., van Berkel, S. R., Endendijk, J. J., Hallers-Haalboom, E. T.,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Mesman, J. (2015). Fathers' and mothers' emotion talk with their girls and boys from toddlerhood to preschool age. *Emotion, 15*(6), 854–864.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085

Wang, Q., (2001). "Did you have fun?" American and Chinese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16*, 693–715. http://doi.org/10.1016/S0885-2014(01)00055-7

Wang, Q., & Fivush, R. (2005).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of emotionally salient events: Exploring the functions of emotional reminiscing in European-American and Chinese families. *Social Development, 14*(3), 473–49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07.2005.00312.x

Wang, Q., Leichtman, M. D., & Davies, K. I. (2000). Sharing memories and telling stories: American and Chinese mothers and their 3-year-olds. *Memory, 8*(3), 159–177. http://doi.org/10.1080/096582100387588

Wang, M.-R., & Shelly ,C.-Y.-H. (2007).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language for emotions. *As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Humanity Sciences, 2*(1-4), 89–97. https://doi.org/10.6413/AJMHS.200712.0089

Zaman, W., & Fivush, R. (2011). When my mom was a little girl. . .: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s intergenerational and personal stori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1*(3), 703–716. 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10.00709.x

Zaman, W., & Fivush, R. (2013). Gender differences in elaborative parent-child emotion and play narratives. *Sex Roles, 68*, 591–604.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13-0270-7

Zell, E., Krizan, Z., & Teeter, S. R. (2015). Evaluating gende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using metasynthe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0*(1), 10–20. https://doi.org/10.1037/a0038208

Zeman, J., Perry-Parish, C., & Cassano, M. (2010). Parent-child discussions of anger and sadness: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 and child gender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28*, 65–83. https://doi.org/10.1002/cd.269

收 稿 日 期：2018 年 11 月 02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9 年 03 月 19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9 年 10 月 08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0 年 01 月 16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0 年 02 月 14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02 月 18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0, 52(1), 51–79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Convers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5-Year-Old Children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Pei-Ling Wang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Convers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a key pathway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s in young children. Emotions displayed through parental conversations enable children to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emotion and learn emotional values in cultural contexts. Gender influence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behaviorally and verbally. This study mainly aims to explore differences in parents' use of emotional words and words in general, in addition to narrative styles and content, when conversing with their children regarding past emotional experience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selected 30 boys and girls aged 5 years with medium-high language proficiencies with their parents; the average age of the children was 63 months (with an age range of 52–64 months). The researchers obtained parental consent to collect data on the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skills and conversations through four emotions of happiness, sadness, anger, and fear. The parents received three instructions from the researchers before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1) limit the four emotional experiences to those jointly shared by parents and child, (2) avoid story narratives, and (3) discuss events that occurred within the previous two months. The goal was to ensure fresh parent–child memories to prevent emotional experiences deviating from the emotional theme (Wang, 2001; Fivush & Wang, 2005, Wang & Fivush, 2005). The researchers recorded emotion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after confirming that the parents had understood the instructions. The parents randomly determined the order of emotional events. After data collection, researchers gifted the parents with a preschool education magazine, picture books, and an NT$300 gift certificate.

After the data were converted into verbatim transcripts, the corpus was coded using the coding of Wang and Fivush based on three criteria. The first criterion was *words and emotion words*. Academia Sinica's online word segmentation system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vocabulary size. Emotion words were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1) descriptive language that demonstrates understanding of the emotional state described, (2) emotional assessment of events, and (3) interjections that express emotions. The second criterion, narrative style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1) *repetition*, when parents repeat the child's words without contributing 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but imply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ld's emotions; (2) *elaboration*, when parents introduce a topic and revisit an even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r provide new information based on a specific event, expressed through at least three consecutive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on emotional topics; and (3)

clarification, when a parent and child have inconsistent understandings of an emotional event and engage in at least three elaborative conversations. The third criterion, narrative content, involved (1) *emotional theme*, when a child describes the origins of an emotional experience as personal feelings o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2) *emotional regulation*, when parents provide their child with concrete approaches for processing negative emotions. Furthermore, *t* tests, chi-squared tests, and two-way mixed analysis of varianc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No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erms of the quantity of words and emotional words used.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father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emo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and that we have underestimated fathers' daily influence on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the fathers were more emotionally expressive and fully discussed emotions during an emotional conversa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This contradicts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an untalkative father. Furthermore, the mothers used more emotion words with boys than with girls in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volving fear. This was probably because the mothers believed that boys should learn to perceive the emotion of fear and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rough words instead of suppressing the emotion of fear.

The results on narrative styles revealed that the mothers were more repetitive than the fathers when discussing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volving happiness. Accordingly, the mothers effectively understood their children's feelings of joy, and the children perceived that their mothers understood their feelings in their words. Compared with the mothers, the fathers more likely wanted to mold thei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and preserve the advantage of men in power and social status (Eagly, Wood, & Diekman, 2000); thus, the fathers more likely used elaborative styles to converse with their children in independent conversations. Denham et al. (2010) argued that fathers more likely respond to boys' and girls' emo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ereotypical gender roles. In this study, the fathers more often elaborated on boys' fear, whereas the mothers elaborated more on boys' sadness. This was because society expects boys to be brave and considers fear as inappropriate (Brody, 1999; Fischer & Mastead, 2000). Therefore, the father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their son's gender role models during independent conversations and believed that the boys must be fearless to take on great responsibilities when they grow up. By contrast, the mothers elaborated on their sons' sadness possibly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boys might experience sadness when subjected to pressure in the future. Accordingly, elaborating on boys' feelings of sadness during childhood enables them to observe, understand, and express the feelings in question at an early age.

The results on the narrative content demonstrated that when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volved either happiness (e.g., joy from going out, getting food, and eating) or fear (e.g., fear of being lost, the dark, nightmares, and sleeping alone), the children mostly described emotions caused by personal feelings. When the emotional themes were sadness or anger, the children more likely expressed emotions caused by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such as "being separated from family," "being punished by the grownups," and "being bullied by siblings or toys being taken away." The parents provided more method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response to a child's feelings of anger; however, most parents did not provide a means of processing negative emotions.

The study findings suggest that parents and parenting educators should particularly focus on the unique influence of fathers on boys' 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y should affirm the special status of father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s in young children and realize the pivotal role of father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s in boys. Parents should provide concrete method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during emotional conversations to teach children ways to regul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urther analyze differences in parents' meanings of words and emotion words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vocabulary sizes.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vestigate the percentage at which specific vocabulary or language forms are used by parents as well as the extent to which parents elaborate on the four emotions and children's possible response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mothers and fathers play key roles in emo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early childhood. However, the limited nature of the sample, comprising parents predominantly belonging to the upper middle class, affected

further inferences. Only a few Taiwanes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topic in question. Our initial findings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parent–child emotional conversations. Subsequent studies are thereby prompted to cre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image of Taiwanese parent–child emotional conversations.

Keywords: gender difference, narrative style, narrative content,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